【编者按】 国际安全问题与国际关系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本刊特邀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教授策划了“朝贡体系与东亚秩序”的专题文章，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和天津师范大学王存刚教授参与讨论。他们认为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朝贡体系则是一种由以中华帝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的特殊国际制度，其对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有着重要意义。在此，本刊编辑部谨向专题主持人刘德斌教授以及两位作者和译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颜震译

【内容提要】 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 leap 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

【关键词】 非对称关系；中国清代；朝贡体系；亚洲基本特征；和平崛起

【作者简介】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吉林大学名誉教授；颜震，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12）。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3）04–0135–10

行为的条件及其过程叙述的研究是不可分离的，然而，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并且各有优劣。我们用结构分析法来描述行为发生的参数、塑造行为者利益的参数、对可行性的看法和效果。但是它的缺点在于把行为本身简化为各种环境因素的集合体，从而让累赘重复的解释性背景因素将有意识的行为及其选择变得僵硬死板。相反，行为的变化过程却将（接续的表现、行为的动力、互动与偶然的创造性作用的）不确定性活生生地展示出来。而叙述的缺点在于夸大历史唯意志论的倾向。本文是一篇对作为亚洲基本特征——非对称性的结构性分析文章。

本文的基本前提是，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

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其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国家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然而，由于清朝并非汉人所创立，而且西方殖民主义入侵愈演愈烈，最终清朝在此双重挑战下葬送了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 leap 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

一 非对称性

非对称关系体现为一种持续性的互动：弱者无意与强者平起平坐，同时强者无意或者无法强迫弱者完全屈服。因此，非对称关系位于对等关系与强弱悬殊关系两极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对双方来说，因为非对称关系的维系是一个长期问题，所以需要建立起一种双方都习惯的互动模式，尽管双方对此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在一种常态的非对称关系中，强者学会尊重弱者的身份，同时弱者顺从于强者的意志。

非对称关系并非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中，也并不仅仅体现在冲突或双边关系中。只要参与者之间实力存在显著差异、无法对调各自地位且无法被（另一方）消灭，那么它们之间长期关系的结构就是非对称的。尽管无法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界线，也无法详细规定哪些实力在理论上是“重要的”，然而非对称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明显的，而且行为体之间在很多情况下也在假设双方的关系是非对称的。

双方无法对调相对地位这一点与两者之间实力差距悬殊紧密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如果一方或双方都预感到彼此的地位在未来会颠倒过来，那么双方之间的互动也会受这种预期的影响。强者会把弱者看作潜在的敌人，而弱者则会野心膨胀。很明显，强者比弱者更加担忧彼此角色的互换，而弱者不管出于怎样的居心，尤其是当自身还无法威胁对方的时候，都不会表现出自己是一种威胁。

在强弱双方对抗中，弱者无法被强者消灭，似乎与强者较强的能力不相符。的确，强者始终存有动用相应实力欺凌弱者并最终征服对方的诱惑。然而，正如历史上“小战争”所证明的那样，即使是全球性大国也会被持久抵抗所挫败。强者必须要向公众解释的每一个有限目的并要做出合理的预算，而对于弱者来说这事关整个共同体的生死存亡，因此抵抗通常是唯一的选择。简而言之，非对称关系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

尽管国际关系中有关非对称的结构性研究已经取得了进展，这种研究也可以适用于任何与上述三种标准相符的关系。例如家庭系统也与能力的差距、角色无法调换以及（通常情况下）各方无法被消灭相符。[①] 同样，次国家行为体在处理与主权政府的关系中通常也表现为非对称关系。如上所述，非对称性与广泛的互动方式相联系，而非仅仅涉及安全问题。非对称性影响国家之间经济、社会与文化交流。不仅如此，非对称性在相当程度上十分重要：当某一行为体在 A 关系中为强者，同时在 B 关系中为弱者，那么它在两对关系中的行为不会完全一致，而是根据其具体所处的非对称角色做出相应的表现。笔者曾经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的越南相对中国是弱者，但对于柬埔寨来说是强者，而越南的确是根据其不同的非对称角色做出过不同的行为。[②]

非对称性的基本结构性效应在于此关系对弱者的影响比对强者来说更大。[③] 所处位置的不同导致利益有着成比例的差异。对比强者，弱者的得失更为明显，而对于强者来说这种非对称关系的重要性要低。弱者对此更为敏感，因为对它来说风险更大，并且缺乏对这种关系的控制力，会显得更为焦虑。强者对此并不会在意，行动中与弱者缺乏协调，相反，弱者会显得异常活跃和敏感。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各方最主要的错误在于将对方看作自身能力放大或缩小的版本。因此强者会怀疑弱者为战略挑战者（要不然它为什么对并不重要的事情如此坚持），而弱者则对强

① Richard Schwartz, *Internal Family Systems Therap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4.

②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The Cases of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6, No. 2 (June 2003), pp. 91-118.

③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4.

者不可预测的恶意感到恐惧（假定这种互动对双方同等重要，那么强者的姿态为何如此令人困惑？它会怎样利用其能力上的优势呢）。强者会忍不住动用强横的手段，而弱者会将这种做法推断为致命的威胁。

既然知觉的差异与相互误解的倾向并存，那么大部分非对称关系在大多数时间里保持稳定则显得有些怪异。但大部分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在非对称冲突中，强者往往无力维持对弱者的控制，而弱者通常即使成功抵抗住强者也会损失惨重。例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越南都没有赢得战争，尽管失败的方式各不相同。非对称关系演进的过程通常是从冲突转为僵局，从僵局转为互相承认，而承认则意味着正常关系的开始。因此正常状态建立在冲突无益的基础上，从而推动相互关系的发展，让敌对状态变得成本高昂而不可能。

一对成熟且正常的非对称关系可以表现为这样一种交易：强者认可弱者的自主权及其在实力上的差距。差距并非屈服，而是对既有的非对称秩序的接受。对自主权的承认意味着对弱者特性和边界的认可。双方的这种交易来自于僵局的经验。在僵局中，强者无法消灭弱者的自主权，而弱者也无法平等地挑战强者。即使接受了关于自主权与差距的交易，非对称关系仍然需要持续的经营，不过这种交易构建了一个正常的互动框架。

新情况的产生是非对称关系的大敌。非对称关系面对新的领导人、权力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变化与充满活力的新意识形态的时候需要进行重新校准。各方都会怀着最好的希望，恐惧最坏的结果。如果可能发生的误解的范围被放大，那么各方对现实的判断会升级为敌对状态。然而，如果非对称关系最基本的标准仍然存在，那么新的僵局很可能会带来新的正常状态。

二 东亚的非对称性

由于中国在人口与资源等方面的中心角色，非对称性成为亚洲国际关系的典型特征。不管中国政府强大也好，虚弱也罢，它始终是东亚理所当然的中心。任何地方的危机都会引发关注，然而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与中国有何内在关系？直到 19 世纪之前，中国是亚洲的重中之重，是亚洲世界无可争辩的中心。

中国中心地位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即中国在边缘区域的主要战略利益为自身的安全和减少边疆地区管理的成本。边缘地区总体上被中央政府视为负担，远不及内部治理问题重要。如亚历山大 • 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指出：“对中国政治理论家来说，直到最近，问题不在于帝国核心区域使边疆陷入欠发展的

状态，而是帝国边疆威胁核心区域的发展。”[①]为了消灭外敌而偶尔进行的战事是这种规则的例外情况。康熙帝在 1696 年对准格尔部葛尔丹的无情征讨中，动用了 83 000 规模的军队（以及 6 000 辆辎重车）来对付 5 000 名敌军。[②]在更普遍的情况下，战争的后勤、开销和受挫会以妥协收场。[③]

中国的中心地位催生了东亚的地缘超稳定性（geopolitical meta-stability）。当帝国“分久必合”、中国的核心区域统一之后，统一的缔造者会让整个区域完全归于一统才会罢休。而当帝国“合久必分”时，军阀和皇位觊觎者们将为了主宰整个区域而厮杀。此外，征服王朝也都曾试图统一中国。

上述特征只是非常粗略的描述，而只有其与西方地缘政治同样粗略的特征进行对比才会发现其意义所在。[④] 它们本质的区别在于中国是亚洲无可争辩的中心，而西方的中心游走于早先的地中海地区以及其后的大西洋沿岸。形成于地中海周边以及横跨地中海的各大帝国表现为不同的地理区位与分散的殖民地。每一个后继帝国都会有一个新的中心，因此会出现多中心相互竞争的局面。领土扩张是与竞争者对抗所必需的手段，而且必须要获取帝国本土以外的资源。罗伯特 • 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存在着竞争性帝国扩张的必然循环，即新增领土的收益递减和维持成本的日益剧增将会让新兴大国的挑战成功。[⑤] 收益递减以及维持成本的增加在亚洲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其形式表现为对边疆的控制，而非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帝国的地理位移。

在国际层次上，康灿雄关于亚洲等级制的文化论点也可以在非对称关系的现实中找到诠释。[⑥] 在与朝鲜和越南等国家的关系中，中国发现最好不干涉他国内政，反过来邻国也发现与中国对抗的代价太高。亚历山大 • 伍德赛德在其经典著作《越南与中国模式》一书中提到，19 世纪早期越南以中国为模板缔造自己的非对称帝国，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对中华帝国的恭顺态度。[⑦]

朝贡文化的非对称根源也许可以从永乐帝试图将越南重新纳入中国的失败（1407-1427）一例中得到最好的体现。明朝占领越南，对越南本土精英及其认同构成致命的威胁，最终黎利（Le Loi）成功地打败了明朝。如果越南之前与中国存

① Alexander Woodside, “The Center and the Borderland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in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s*,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 p. 21.

②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80-190.

③ 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9-58页。

④ Brantly Womack,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ing,” *China Among Unequal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ry), 2010, pp. 153-182.

⑤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⑥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⑦ 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在文化上的差异，那么应该会导致与中国的决裂。而相反的是，与明朝随后建立起定期正常的朝贡关系后，在黎利的继任者黎圣宗（Le Thanh Tong）的统治下，越南进入吸纳儒家文化的黄金时期。[①] 黎圣宗的汉化（sinicization）行为并非是要归附中国——而是恰恰相反。他将中国视为“最佳范例”，恢复朝贡关系正是因为越南面对中国时对自身的地位非常有自信。此外，与中国建立正常的非对称关系稳定了越南的北部边界，从而可以开始放手向南方发展。

政治非对称关系在国际层面最为明显，但我们同时也要思考中国的中心－地方关系模式是否也是非对称的。一方面，也许中国的核心区域与农业基地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允许一种较轻程度的中央管理与地方灵活性相结合的模式，从而排除了封建联邦制的束缚；[②] 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地域广阔，对地方的密切监督也不现实。中央宛如漂浮在臣服的地方之上的一叶轻舟，而规避暴风雨则是官员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③] 中央对地方利益和边界的承认表现为一贯的强行征税和将地方视为自身组成部分的意愿上。地方的不同之处表现为避免公开对抗以及对征税的服从。在正常的国际非对称关系中，持续性的互动发生在这种大框架下。

某些地方与中央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军事殖民地起先是中央在难驾驭的地方上势力的扩展，之后该地方逐渐有了自身的特性与利益；另一方面，中央与处于世袭地方领袖（如土司）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关系类似国际关系的模式，只不过中央对叛乱或分裂倾向尤为敏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比中央，中国的边疆与邻国有着更为直接和复杂的联系，这体现了中央控制和边疆地方主义的辩证关系。

三 非对称性与清朝

清朝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对非对称关系的管理，但也遇到了崭新的情况。在国内存在着满人身份与作为中国统治者的紧张关系。在外部，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对东亚的入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东亚社会的转型，则意味着传统非对称关系的终结。

套用利亚姆•凯利（Liam Kelley）最为恰当的词句，清朝是“天朝礼仪之邦”最后的也是最有经验的维护者。[④] 再回头看越南，在明朝占领失败后的约五百年时

① John Whitmore, “Northern Relations for Đại Viêt: China Policy in the Age of Lê Thánh Tông (1460-1497),” in John Whitmore and James Anderson, eds. *Forging the. Fiery Frontier: Two Millennia of China’s Encounters with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Leiden: Brill, forthcoming.

② Michele Pirazzoli-t’ Serstevens, *The Han Dynasty*, New York: Rizzoli, 1982.

③ Brantly Womack, “Asymmetric Structure and Culture in China,” in Alexander Whitmore and James Anderson, eds. *Forging the Fiery Frontier*:*Two Millennia of China’s Encounters with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④ Liam Kelley, *Beyond the Bronze Pillar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间里，正常的非对称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当然，定期的朝贡、慷慨的礼仪与差距的认可等华丽外衣之下仍然存在着不安因素。最大的危机是 1788 年至 1789 年的西山起义后，中国派兵进入越南支持被推翻的黎朝。[①] 不过这次进入越南是应接受过中国册封的黎朝国王的邀请，并且受到广东地方官员的热切支持。北京朝廷则缺乏信心，当远征军将领上报得知黎朝不得民心时，清军在未尝败绩便开始撤离。当阮文惠称帝后，他派了一名替身前往北京接受册封，这名替身在乾隆帝八十大寿庆典上作为贵宾受到礼遇。这件事表明，即使在已确立的非对称关系内，进行管理的过程也是困难的。不管怎样，回归正常关系对两国仍然非常重要。

清代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紧张态势大多数集中在边疆区域。边疆本身并无争议，但跨越边界的少数族裔构成其人口的大部分，而且边疆地形崎岖不平，两国政府都无法将边疆牢牢控制住。当地实权者可以积聚力量，并可以跨境避难。地方政府也有着跨境合作，但合作的条件却是不平等的。双方会互相遣返嫌疑犯，但中国人会越境追踪逃入越南的罪犯。[②]

总的来说，清代的中越关系体现出传统非对称关系的典型特征。成熟的朝贡体系既非友谊也非征服，而是保持一定距离的礼仪化的再保证，即一方不会给另一方带来麻烦。如伍德赛德指出：“越南朝廷并不热衷与北京保持亲密关系，而只是出于必要才发展与北京的关系。”[③] 两国关系破裂不会给北京带来好处，而越南会损失更大。这种关系是正式确立的，尽管双方的看法差别很大。中国会想象自己集举世公认的至美大德于一身。而越南统治者在国内则会否认处于朝贡中所暗指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国王（在国内则被称为皇帝）会避免亲自前往北京，而使用金像和替身来代替。

“越南”国名的历史最能说明隐藏在礼制和谐之下的相互差距和缺乏自信。新登基的阮朝皇帝嘉隆帝（Gia Long）在 1803 年要求使用“南越”的国名，但乾隆帝认为在汉代曾存在过以广州为中心南越国。因此将国名倒过来，成为“越南”。尽管顺化朝廷并没有表示拒绝，但私下里他们使用“大南”这个国号，同时把仍使用旧称“安南”（平定的南方）的未拆封信函退还给北京。[④]

国内关系与对外关系的重大区别在于，小国象征性地向皇帝承认自身地位的差距来换取领土与政治自主权。这种模式在清代前半叶尤其复杂，因为清朝同时

① Truong Buu Lam, *Patterns of Vietnamese Response to Foreign Intervention: 1858-19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11,1967.

② J. Kim, “The Rule of Ritual: Crimes and Justice in Qing-Vietnam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Qianlong (1736-1796) Period,” in Alexander Whitmore and James Anderson, eds. *Forging the Fiery Frontier:Two Millennia of China’s Encounters with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③ 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p. 241.

④ 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pp. 120-121.

拥有中华王朝和非汉人征服者的双重身份。尽管清朝比起元朝在建立新关系的时候更为明确与谨慎，新的情形对非对称关系的管理仍然带来了挑战。在东南亚，虽然人们只接受中华正统身份，但是从明朝到清朝的过渡却十分平稳，尽管明朝遗民把边疆地区作为避难所，甚至很多人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定居。清朝朝廷在非汉化的陪都承德接见蒙古人和藏人体现了边疆民族友爱之情，更巩固了他们与清朝的联系。尼古拉•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指出："如果说非主体地区与人民认同自身在政治上与帝国的核心（皇室抑或行政体制）存在着联系，那么清朝比明朝和宋朝更像一个帝国。"[①] 当 19 世纪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时，清朝或多或少成功地在非汉族边缘地区外围建立了稳固的国境线。

清朝满人对汉人中国的统治最终被接受，但八旗兵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无能导致地方武装力量的崛起。[②] 地方军事实力的增长、爱国反清旗帜的打出与对外事务中心地位的不断丧失，这一切共同导致了 1911 年清朝的覆灭。但王朝覆亡和太平天国起义后军阀喧嚣而起的最可能结果并非是恢复到 18 世纪传统的轻度治理，而是活跃的中央与更为活跃的地方之间的再造的关系。

西方帝国主义持枪携炮来到东亚，彻底改变了传统非对称关系的全球与区域环境。尽管 19 世纪西方在军事上戏剧性的胜利更为引人注目，笔者却认为，即使清朝赢得鸦片战争，并采纳事后诸葛亮的每一项建议而变得富强，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仍然会因一种更开放且更加活跃的世界的到来而遭到根本性的颠覆。中国的邻国现在有了别的选择——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强加的，却摆脱了朝贡的心态。

在现实中，清朝从 1840 年到 1900 年经历的一连串军事灾难直接影响了东亚的经济体系。白银从中国在越南北方经营的银矿涌入英国，造成通货膨胀。更为重要的是新的西方观念的涌入。越南在 1790 年建造了亚洲第一座沃邦城堡（Vauban fortress）西贡要塞，比法国在岘港登陆早了约七十年，并且雇佣外国军事顾问和购买武器。[③] 1868 年，一名天主教教士热情洋溢地判断，越南将摆脱僵死的中国模式，会在未来转而学习法国模式。[④] 但是，与明治时代的日本不同，越南皇帝选择

---

① 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0, No. 2 (June 1998), p. 288.

② Philip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ephen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New York: Knoph, 2012..

③ Frédéric Mantienne,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Military Technology to Vietnam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Case of the Nguyê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3 (October 2003), pp. 519-534.

④ Nguyen Truong To, "Memorial on Eight Reforms Urgently Needed (1868)," in Buu Lam Truong , ed., *Patterns of Vietnamese Response to Foreign Intervention: 1858- 19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pp. 92-93.

寻求中国的帮助，而它的命运却最终被 1885 年的《天津条约》所决定。东亚非对称模式最终远离了中国。暹罗则对此地区的变化更为警惕，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外交，在 1855 年后停止了对中国的朝贡。[①]

四 东亚非对称性的过去与未来

尽管 1840 年以来局势逆转，中国对其邻国来说仍然重要，非对称关系也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②] 然而，在 2008 年全球经济进入不确定之时，中国经济仍然以引人瞩目的速度增长，中国重回亚洲中心的前景再次出现。中国在地区与全球经济的份额超越了其他地区与全球性大国。其可预期军事实力将可以在近海领域与美国海军保持相持态势。有人担心中国的邻国开始成为其后院。[③] 在东亚之外，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很可能在 2016 年至 2020 年间超越美国，并在 2030 年达到美国规模的两倍。这种发展与前景引出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传统的天下观对中国的全球地位的凸显有何关系？中国再次成为东亚不可动摇的中心有何意义？

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似乎在某些方面正重拾曾经的主导权。西方的优势建立在与其他地区逐渐拉大的科技鸿沟上。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1 世纪的技术扩散正在全球范围内拉近人们的生活机遇、人均生产力和教育。要想达到人均上的平等不太切合实际，而且国家内部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但技术转让远比技术创新简单，这会使各国缩小技术差距。中国拥有美国四倍的人口，因此中国只要在人均生产力上达到美国 1/4 的水平就可以与其综合经济规模相匹敌。

但是，人口的力量远不同于技术力量。中国在技术水平上仍然会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其分配的压力也要比美国大四倍。尽管发展中国家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却无法取代发达国家的地位。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据联合国估计，到 2050 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达到 49 岁（当下日本为 48 岁），超过 80 岁以上者将数以亿计。[④] 与此同时，如果美国继续保持目前的移民政策，人口将会达到中国人口总数的 1/3。印度的人口将超出中国 1/4，且比中国的老年人口少一半。中国人口到 2050 年预计达到 14 亿，而世界人口将有 97 亿，因此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1/5 降至 1/7。当中国在生产力与消费能力上依然保持

① John Wills, “Qing Relations with Annam and Siam, 1680-1810,” *Toung Pao,* forthcoming.

② 例如，参见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pp. 142-235。

③ Brantly Womack, “The Spratlys: From Dangerous Ground to Apple of Discord,” *Contemporary South East Asia*, Vol. 33, No.3 (December 2011), pp. 370-387.

④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世界政治经济重要中心之一的时候，其人口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比起全球范围，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更为显著。中国是除阿富汗之外每个亚洲国家排名位列前五位的贸易伙伴，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三个美国最重要盟国的首要进出口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以及缔造上海合作组织为其地区领导权建构了多边框架。然而，与中国非对称关系的前景以及存在着尤其是海洋主权争议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让邻国更忧心成为中国后院的后果。中国的邻国拥有充分的理由去发展跨地区关系，而全球化正在使其变得可能。

如果我们思考到中国在世界角色上升中可能的三种历史模式——冷战时期、战国时期和帝国时期，最后一个时期的教益最为丰富。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地位的凸显以及美国声望相对的下跌让人们联想到冷战模式。 然而，全球政治经济的去中心化本质让两极体系最为关键的集团和集团内部规则变得不可能。此外，中国的安全战略并非是要进行非对称的军备竞赛，而更多是打造争取控制周边地区的能力。

战国模式体现为更多不固定的联盟关系，全球化时代排他性的联盟对于小国来说是个糟糕的选择，而核武器让无限制的大规模战争成为过时的选项。在拥有众多选择的世界里，大国确保小国合作的最好方式必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依靠武力优势的基础上，而小国的关键利益则在于此关系的非排他性。

显然，清代中国的优越感在现代世界已然不合时宜，而朝贡体系的薄弱本质和礼仪化形式也无法适应全球化世界密切的国际关系。然而，对非对称关系的管理以及用对小国身份与利益的承认来换取两国地位差距的认可的确为当今各国间不平等的现实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模式。上文所提到的非对称关系的三种标准——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对于当下大部分国际关系来说都是现实。尤其相对其邻国来说，中国已经重新达到以上几项标准。但从几个世纪以来体现出的自身局限来说，中国应该谨慎抵制获取支配地位的诱惑。

【收稿日期：2013-04-25】
【修回日期：2013-05-25】
【责任编辑：王湘林】